

文天祥“集杜诗”创作及其文化蕴含

陈冬根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摘 要: 宋末文天祥被俘羁押在燕京狱中之时,创作了一组特殊的诗歌,即“集杜诗”200首。文氏选择集句诗这样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又专集杜甫的诗句以成篇,既反映了杜诗对宋人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更反映了文天祥对杜甫的精神的认可与接受。文氏这组诗具有明显的文化蕴含:一是最显其“忠君爱国”之思想;其次是对杜诗之苦难精神的认同。

关键词: 文天祥;集句诗;集杜诗;忠君爱国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5.021

一、关于集句诗

集句诗,又称集古诗,一种说法是始于北宋初,另一种说法是首创于王安石。^①不管哪种说法,都不能否定集句诗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其实,所谓集句诗,就是从前人或同时代名家已有作品中,分别拈出的一些经典的句子,重新组合成一首新的诗歌。这种诗歌体式盛行于北宋中后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孔平仲都是集句诗创作高手。王安石雅好集句诗体,《临川先生文集》第三十六卷全部为“集句诗”,此外第三十七卷还有三首。“集句诗”的出现,反映出了在宋代诗歌发展中,不仅遭遇了题材、体式开拓的困境,就是在语言上,也遭遇难以突围的困境。而王安石等人这种集句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集句诗实际上是宋代诗人逞才使能的一种表现。王安石自负才气,酷好此类诗作。如其集句诗《明妃曲》等就是这类代表。其诗曰:

我本汉家子,早入深宫里。远嫁单于国,憔悴无复理。穹庐为室旃为墙,胡尘暗天道路长。去住彼此无消息,明明汉月空相识。死生难有却回身,不忍回看旧写真。玉颜不是黄金少,爱把丹青错画人。朝为汉宫妃,暮作胡地妾。独留青冢向黄昏,颜色如花命如叶。^[1](卷三十六)]

仔细读这首诗,可以发现,作者几乎是集采了古今所有咏王昭君的诗句,然后组合成一篇新的诗作,以此来传达他自己思想,即王安石对昭君出塞之历史事件的当下思考。

通常,集句诗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牵强,毕竟是用他人成句来组合一首新作。但王安石这首集句诗,不仅韵脚格律合乎标准,而且十分符合王氏其作之主题,即切题。此非大手笔不能为。难怪严羽要说:“集句惟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肝肺间流出。”^[2](P卷二 21)]王十朋也说:“集古诗,前古未有,王介甫盛为之,多者数十韵,盖诵古人诗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往往

收稿日期:2016-08-11

基金项目:江西省“十二五”社科规划项目“庐陵文化与宋明庐陵作家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4WXQ02)。

作者简介:陈冬根(1976-),男,江西吉安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庐陵文化研究。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王直方诗话》认为始于王安石。不过宋代诗话有不同记载。如《西清诗话》载:“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至元丰间,王荆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蔡宽夫诗话》云:“荆公晚年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归仁诗,已有词作,自号定安八体。……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无复佳语耳。不知公尝见与否也。”“集句诗”之名世所知,当自王安石开始。如果从有意为之而论,以王安石“始为之”亦未尝不可。从文体角度,本文从《王直方诗话》说。

对偶亲切。其后,人多效之者,但取数十部诗,聚诸家之集耳。”^{[3](卷二二,P1156)}这正是宋人“以才学为诗”的表现。当然,这种倾向其实在真宗朝“西昆诗派”那里就存在。

王安石等人这种“集句诗”的创制,与他们熟读前人特别是唐人诗文集有关。诗人们胸中有百万言,只需借前人成语即可传达其心意。这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王安石之外,北宋中后期“集句诗”最为知名的是孔平仲,仅《寄孙元忠》组诗31首就全部为集句之作。但集句诗在文天祥之前,水平最高的当属王安石。

集句这种诗歌形式的创制,源自于宋代特别是熙、丰以来诗人的游戏心态和宋人“以才学为诗”、“资书以为诗”的文化趣味心理。往往越是知识渊博、诗法高妙之人越能将“集句诗”做得圆熟,句皆如己之肺腑所出,如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就是非常之能手;反之,则生硬难解。同时,集句之作,要求速成巧妙。黄庭坚所谓“其法贵拙速,而不贵巧迟”。^{[4](P27)}虽然黄氏这里“不贵巧”而宁可“拙”,但实际上是捷速与巧妙都看重的。

不管是要求学识还是要求快速,集句诗的创作都需要作者才思敏捷、知识储备的丰富。一个诗人,必须是才情与学养兼备者,才可以做得得心应手。否则,就有生硬之嫌,如苏轼对孔平仲所作的批评那样——只是“路旁拾得半段枪”。《西清诗话》曾记载:“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此中言石延年“人物开敏”才使得集句诗“大著”,亦足证明这种诗歌体式在创作上对“速成巧妙”的要求。所以惠洪说:“集句式其法贵速巧,如前辈曰:‘晴湖胜镜碧,衰柳似黄金。’人以为巧,然疲费精力,积日月而后成,不足道也。”(《冷斋夜话》原文与之略有不同)梳理诗歌史我们不难发现,但凡创作集句诗者,皆颇富才情者。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二、文天祥的“集杜诗”创作

在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里,文天祥创作了一组特殊的集句诗,后世称之为“集杜诗”。这种诗即是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构成一首首新的诗歌。这是文天祥生命的晚期在燕京狱中所创作的,一共200首,全部为五言绝句。这些作品后收入其

文集,专列“集杜诗”一卷(亦有作四卷本),甚至有单行本,即本文所依凭的《文信国集杜诗》。由是,这组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文天祥这组集句诗从诗题上来看,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这组诗从第一首到第二百首,大部分的诗歌有标题,如第一首《社稷》、第二首《度宗》、第一百二十首《刘沐》等,但从第一百五十八以后基本只有诗歌顺序数目而没有诗题。其次,这组诗歌的标题大部分以诗作所涉及的对象为题,如第一百一十七《闽三士》、第一百一十八《诸幕客》、第一百二十二《彭司令震龙》等,这类诗歌数量所占比例比较大,大体是从第一首至第五十二首(《陆枢密秀夫》),又从第一百一十《金应》到第一百五十五《次妹》。再次,另有一部分诗题不标明所涉对象,而是标明诗人行迹,这类篇章可算是文氏的纪行诗,大体从第五十三(《勤王》)到一百八《入狱》(从第九十九至一百四同题)。最后,还有一小部分诗题是概括性的,其主要是为了揭示诗作主旨,第一百五《怀旧》(从第一百五至一百九同题)、第一百三十九《坟墓》和第一百五十六《思故乡》等。

从诗歌形式上看,文氏这组诗大部分作品题目下面都缀有小序,即题序,可谓是诗题补充性说明文字,用以说明该诗歌创作的背景或主题。这些序多数都比较长,远远超过正文的内容。这些序文在文氏这组诗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诗作的主题,或了解该诗创作的前因后果,即所谓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掌握文天祥的一些生平史料。例如:第一百四十三《妻》,其题序云:“丁丑八月十七日空坑之败,夫人欧阳氏、女柳娘、环娘、子佛生、环之生母颜、佛之生母黄,并陷失。寻闻,自隆兴北行,惟佛生已死。人世祸难,有如此者。”这些题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天祥的家庭成员及其生死存灭情况。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说明详细的题序,诗作中所要表达的东西,后人几乎无从知晓。例如第一百四十一《母》之题序云:

先母齐魏国太夫人,盖自敌难后弟璧奉侍赴惠州,弟璋从焉。已而之广,之循,之梅。予来梅州,母子兄弟始相见。既而鱼轩出江西,寻复入广,夫人游二子间,无适无莫,虽兵革纷扰,处之怡然。戊寅,行府驻船澳,弟璧仍知惠州,弟璋复在侍夫人

药。八月,两国之命下,时已得疾,九月七日寅时薨逝。弟璧卜地于惠、循之深山间。不肖孤已矣,未有返葬夫人期,不知二弟何时毕此大事。身陷万里縲绁中,岁时南望,呜咽云。^{[5](卷前《自序》)}

如果没有这段诗序,后人恐怕很难弄清文天祥的母亲晚年的生活情形及文氏兄弟伺奉其母的情况。

此外,文天祥这组“集杜诗”每首诗作中的诗句,诗人都在诗行中注明出自杜甫哪首诗,便于读者检视。同时,也便于读者理解文氏本作。因为如果读者一时不知出于杜甫哪首诗,那么对文氏该诗作的理解也会产生偏差,甚至是障碍。

如上文所述,集句诗并不新鲜,宋初即已有之。集句诗以集前人经典诗作为主,故所集之句多名言,甚至有专门集某部经典,即便是像文氏这种专集某类诗作而成文,也有前例。例如,王安石《烝然来思》《示杨德逢》二首则全部是集《诗经》的句子;孔平仲的《集文选句赠别》《文选集句寄慎思交代学士》等作则是专集《文选》成句。但就集句诗而言,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孔平仲,亦或是黄庭坚等其他诗人,他们都尤其好集杜甫之诗。这与其推崇杜甫诗分不开,也与宋代杜诗地位迅速上升有关。而杜甫及其诗歌在宋代地位的崛起,除了与“儒学复兴”运动有关之外,与“千家注杜”的文化背景亦有重要关系。这种专集杜甫诗歌之作,在宋末的文天祥这里得到发展。

“集句诗”所集之句往往出自于近体律诗,但也有相当部分是集古体诗句。这取决于作者的喜好和情景需要,并没有特殊规定。因为集句诗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显示诗学才艺的带有游戏性质的创作,本来就具有打破陈规的初始意义在里面。文天祥这组集句诗,就是专门集采杜甫一个人的五言诗句,构成一组全新的诗歌作品,而且规模宏大。无论是在杜甫接受史上,还是集句诗发展史上,都十分引人注目。可以说,文天祥这一组“集杜诗”无论是对于文学史,还是对于文化史,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虽然“集句诗”向来被视为文字游戏,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所集之新诗必须能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否则,就不算成功。这种集句之作有的时候,其意与其原作相去甚远。通读文天祥这200首

“集杜诗”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这一点。

例如,文氏“集杜诗”之开篇《社稷第一》:

南极连铜柱(《送李晋肃》),煌煌太宗业(《北征》)。

始谋谁其问(《舟中苦热》),风雨秋一叶(《李光弼》)。

如果不是诗作前有小序,我们并不容易将诗作的每一句与江山社稷连在一块。而第一句、第三句和第四句,在杜诗原作当中与江山社稷之含义并无太多关联。换句话说,文氏集句之作与老杜原作之间有了较大的文意转移。但如果结合文天祥此诗之题旨、小序(“三百年宗庙社稷,为贾似道一人所破坏,哀哉!”)及其在集中的排序情况,我们的确可以说,这是一首完整的感叹大宋三百年江山之将颓的诗作。

又《建康府第十五》写道:

亭亭凤凰台(《凤凰台》),江城孤照日(《登牛头山亭》)。

胡来满彤宫(《往在》),驱马一万疋(《北征》)。

这首诗所选杜甫诗句,虽然第一句和第二句诗题涉及到了建康府(今南京),但第三句和第四句基本与之无关。而第一句和第二句杜诗原作,又与文氏此诗所要表达的建康作为首府被敌人占领之意思不同。文氏这首诗传达的是一种“黍离之悲”。这种情形在文氏这200首“集杜诗”中比比皆是。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文天祥的“集杜诗”是具有明显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不是依附于杜甫诗作的影子诗歌,更不是北宋初期那种游戏之作的集句诗。文氏这些诗作,虽用杜甫成句,但每一首都是情真词挚,意境完整,如出己手;不仅写出了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过程,而且深深融入了诗人自己的感受。正如文天祥自己在“集杜诗”的《自序》中所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5](卷前)}

文天祥的“集杜诗”创作的出现,再一次证明杜甫对宋末诗坛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说明,集句诗这种诗歌形式有可能改变其游戏文字的性质而成为严肃的创作,虽说这也许是文学史上仅有的一个范例。

三、文天祥“集杜诗”的文化意蕴

从阅读北宋以来的集句诗作可知,集句诗本是始于一种游戏创作,其核心目的就是显示作者深厚的学识和高超的诗歌写作技巧。毫无疑问,文天祥这一组200首之巨的“集杜诗”之作,其所展现的文氏的才力、学识,亦恐非一般诗人可以企及。依据史书来看,文天祥之才华横溢,是不用质疑的。宝祐四年(1256),二十岁的文天祥,即被理宗皇帝钦点为状元,可谓少年得志。其才情和学识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德祐二年(1276)正月,四十岁的文天祥担任临安知府。不久,又临危受命,出任为枢密使,旋改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作为使臣到元军中讲和谈判。故此,文天祥的才华学识在当时是公认的。并且,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文天祥对自己的才学应当是颇为自负的。其在狱中自作200首“集杜诗”,正是这种情态的反映。

但是,文天祥这一组200首集杜诗作,显然不只是北宋时代多数集句诗作那般,属于游戏竞技之作,也不仅仅是其在“自序”中所说的“世变人事,概见于此”那么简单,而是富有更为深刻的意蕴。虽然现在没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天祥的“集杜诗”创作有什么特殊的目的,或者直接告诉我们他想说明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推断:毫无疑问这是文天祥在借此展露自己的心迹。换句话说,狱中的文天祥在用杜甫的诗句最后呈现自己那颗赤诚的忠君爱国之心。

文天祥一生中,用诗歌表露心迹的情况很多,“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扬子江》)“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等等,皆为经典名句。所以,文天祥在燕京狱中自己决意赴死的情境下,其所创作的这一组“集杜诗”绝非闲来之笔,而是在向世人告白。

(一)忠君爱国之心迹展现

文天祥之所以选择专门集杜甫诗句以抒怀,不仅与自己熟悉杜诗有关,而且与宋代以来杜甫形象及地位上升有关系。杜甫形象之所以在宋代大幅度上升,又显然与杜甫及其诗歌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忠君爱国者形象密切相关。^{[6](P110-112)}文天祥接受并认可了杜甫这个忠君爱国者形象。而且,文

天祥也是在以此向世人传达一种信息:我文天祥与杜甫一样,是一个以“忠义”为生命的人。

南宋德祐年间,元兵南下,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度宗庶子益王赵昰退守福建一带。不久改元景炎(1276),赵昰在福州即位,史称端宗。此时文天祥等人为元兵所阻,不得不绕道,从南通搭船到浙东转往福建,途经扬子江。文天祥作诗以明志,即《扬子江》诗:“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7](P89)}诗中“南方”,指南宋端宗朝廷;磁针石,即指南针,诗人以之比喻自己的一片忠义之心。此诗与杜甫之“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所展露的心迹一致。至此,诗人万死不渝、忠君爱国之形象赫然挺立。

当然,杜甫之忠君爱国之形象的树立,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刘辰翁等一大批著名诗人的阐释与推崇有关。分析比较王安石对杜甫和李白的不同评价和认可可知,王安石对杜甫的认可主要不是源自于对杜甫诗歌技艺的推崇,而是源自其对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的认可。王安石《杜甫画像》清晰地显示了这点。王诗以极度的崇敬语气写道: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镂。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1](卷九)}

这里,王安石最推崇的是,杜甫在自身苦难之中,竟然始终不忘记关心朝廷和圣上,也没有忘记关心人民。这里,王安石所肯定的重点是杜甫“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这类思想品格和精神。而这种精神品格恰恰是儒家所宣扬的。中唐以后,特别是宋兴以来,儒学处于一种复兴之态势,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在宋代重新被扬起。范仲淹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诸语,正是宋人对这种精神的确认和弘扬。杜甫,恰是一个极好的弘扬儒家精神

的范本,或者说是一个极佳的文化符号。

所以,苏轼等人更深一步阐释了老杜精神。他在《王定国诗集序》中说:

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8](卷十)}

杜甫“一饭不忘君”的忠君爱国形象,在王安石、苏轼、孔平仲等人的塑造下迅速立起来。杜甫的这种伟岸形象,后来到黄庭坚和江西诗派那里得到了强化。如《潘子真诗话》引黄庭坚语:“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9](P310)}黄庭坚完全把杜甫的诗文和他的人格精神融为一体。

文天祥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发现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光芒的。正如刘伟在文氏“集杜诗”之《原序》中所说:

宋有天下三百年,待士之礼甚厚,至其季世,死事者不少。独丞相信国文公天祥之名最著,以其拘幽数年,略不改节,卒之,从容就义,视死如归,此则众人之所难者,其详已载国史。公初在燕狱中,不遑他及,日惟集杜工部之诗句以写忧国之怀。句虽得之少陵,义则关乎时事,读之未有不惨凄而怛悼者,且少陵在唐有才而不尽用,不得已托之吟咏之间,所选三(当为“二”)百篇之作,谓其可配风雅,信公独有取焉。忠义之在人,古今无间若此。^[5]

此中,刘氏指出,文天祥落难在狱中三年,常诵杜诗以销日抒怀,进而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了杜诗深处的那种忧国之思,于是才有集杜诗之作。在刘氏等人看来,文天祥之所以创作这一组诗,其首要意思就是发现并深深认可了杜甫那种“忠义”之节。

文天祥本来就是以“忠义”之面目立于世,翻开文天祥的文集,满纸是君臣之义、爱国之言。特别是其《题苏忠武节图》(三首)等诗作,更是皆汉代以忠义名节立世的苏武之事来抒发自己的忠义之怀,其中有言:“忽报忠图纪岁华”、“烈士丧元心不易”、“生平爱览忠臣传”(其一)、“忠真已向生前定,老节须从死后休”(其二)、“铁石心存无镜变,君臣义重与天期”(其三)^{[7](P42-43)},均是始终围绕君

臣大义而发。

但是,抗元兵败后,文天祥即被蒙元统治者一路押送北上,最后囚于燕京狱中。此时,文天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以身殉国,以身死节。然其恨自己身处狱中,恐世人无以知其“忠义”之心,所以要借诗文以抒壮怀烈志。由于谙熟杜诗的缘故,他此时发现自己想要说的话,竟然杜甫在几百年前都说到了,从而想到借杜诗来言说。正如文氏在《自序》中说的:“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5](《自序》)}这恰是后来李贽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二)苦难中的精神认同

应该说,文天祥如此大规模的集杜甫之诗作以成文,其创作心理动力除了对杜氏的忠君爱国之精神的认同之外,还隐含着另外一个深层的心理因素,那就是文天祥对杜甫那种苦难中之坚忍不拔的人格精神的认同。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几乎没有过什么安稳舒适的日子,充满苦难。但是,面对各种不期而至的苦难,杜甫从来没有退缩,更没有绝望过。他始终以坚韧的精神,去走过人生的每一道坎。在文天祥看来,自己的一生也是与苦难相随的,特别是人生的后半程。在苦难的日子里,如果你不想放弃,那就需要寻找一种精神支柱。这支柱不仅是那种崇高的“忠义”,也可能是那种能够穿透苦难人生的坚强的生活典范。杜甫无疑是个极好的榜样。

翻看文氏的文集,大量的诗作都是在记载自己的人生遭际。文天祥特别偏好以诗记患难中的遭遇,哀苦之声不绝于纸面。他的《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等作品的“自序”中,都是在反复说明他历经患难,如起兵勤王,兵败被俘,被押北上等经历。这些诗作中充满了一种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苦闷与孤独之感。虽然如此,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奋斗,更没有完全绝望。而是在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和鼓劲。如文天祥曾有诗句这样写道:“百年落落生涯尽,万里遥遥行役苦。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7](P104)}实际上,这是祥兴二年四月文氏被蒙古兵从广州押送北上时所写的一首表明

心迹的古体诗,即《言志》,其中虽言及自己遥遥万里的苦役,遭遇百难,生不逢时,但找到了精神的支撑点,即所谓“求仁得仁”。

再具体说文氏这组“集杜诗”,更让人感觉满纸的苦难史。例如,这二百首诗作中,就有很多题序中反复出现“哀哉”、“痛哉”、“岂非天哉”之类的字眼。这恰恰是诗人对苦难命运的咏叹。在这些人生艰难中,诗人始终没有屈服于命运,更没有屈服于外在的压力,依然不变的是对南宋王朝的忠心,

是对自己内心信念的坚守。文天祥以自己历尽艰难困苦的一生,诠释了一个理学土壤中站立的优秀士大夫的精神品格。

概而言之,文天祥一改集句诗的游戏色彩,转而将这种形式的创作引向严肃主题。他在集合杜甫那些五言诗句的时候,将自己全部融入,已然忘记了是杜甫的句子,反而感觉是杜甫在替他代言。这之中,不仅有对杜甫一生苦难精神的认同,更有对杜甫及其诗歌中蕴含的“忠义”的认可与接受。

参 考 文 献

- [1]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 [2] 魏庆之.诗人玉屑[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3] 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4] 惠洪.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M].陈新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5] 文天祥.文信国集杜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陈冬根.北宋中期以来杜甫及其诗歌升格略说[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 [7] 文天祥.文天祥集[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
- [8]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9] 潘子真诗话·山谷论杜甫韩偓诗[A].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On Wen Tianxiang's " Poems Based on Quotation of Du Fu" and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CHEN Dong-ge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in Yanjing, Wen Tianxiang created 200 special poems, that is, the " Poems based on quotation of Du Fu" . Wen's use of quotations of Du Fu's lines reflects the influences of Du Fu's works on Song poets and also his own appreciation and acceptance of Du Fu's thoughts. Those 200 poems are culturally connotative in the writer's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nd the nation and his admiration of the spirit of endurance contained in Du Fu's work.

Key words: Wen Tian-xiang; quotation poem; quotation of Du Fu; loyalty to Emperor and Nation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